

# 东营日报

中共东营市委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37—0054  
代号 23—172 第 1202 期  
1997 年 3 月 7 日 星期五

## DONGYING RIBAO 周末

利津县的北岭乡常常被人称作“文化乡”。在这方普普通通的土地上，我生长了二十几年，观察了二十几年，思索了二十几年。至今仍然无法搞清楚是文化孕育了一代代文化人，还是一代代的文化人支撑起一个远近闻名的文化乡。人杰地灵，或者说地灵人杰，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抑或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互为表里，互为因果？这又是一种客观辩证的归纳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答案是什么？答案在哪里？让我再一次循着历史的足迹，用白描的手法记下我所熟悉的一切，然后任由对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感兴趣的朋友们去参详，去领悟。“一山一水一圣人”，这句对齐鲁文化最精妙最深沉的概括，一经现代化的信息传媒的扩散，一夜之间便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可是，你知道这句名言的专利权归谁所有吗？不必向你卖关子，最先做出这般的总结归纳的，是160多年前山东利津县北岭乡的岳镇南。

岳镇南，字文峰，南宋忠武王岳飞二十六代孙，系岳雷一脉。他自幼天资聪颖，有目自诵之才，青年时代博览群书，以文章见长。清嘉庆十二年（1807）中举人，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道光十一年（1831）奉旨典试湖南，后留任湖南学政。道光十六年（1836）出任江西知府。

岳镇南湖南任职时，有一次中秋佳节与当地官员一起饮酒赏月。席间有人对镇南不甚恭敬，有意夸耀江南的物华天宝，说“江南千山千水千才子”，然后不无挑衅地问镇南山东的情形，镇南当时不卑不亢，从容答道：“我山东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唯一山（泰山）一水（黄河）一圣人（孔子）而已。”一言既出，举座叹服。镇南由此名声大振，想来湖南学政在他任内盛极一时也与此不无关系。

岳镇南的聪慧才思历代北岭人引以为荣。学文化，长知识成了北岭乡历代青年崇尚的成才之道。

在北岭乡能与北岭子岳家相提并论的是孟家庄张姓人家。

张志奇，字鸿儒，幼年失怙，由其母抚养长大。张母大抵深得古人教子之道，虽则家贫，却一心供养儿子读书，以图将来金榜题名，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相传张志奇小时候贪玩，有一次母亲下地干活，留他一个人在家，回家时竟然四处寻找张志奇不见。张母大惊，一边央人帮助出外寻子，一边求菩萨拜佛，烧香许愿，好一阵忙乱。谁料张志奇竟不声不响地从灶堂里钻了出来。照常理，大人急成那样，孩子却这样不懂事，早该拿笤帚疙瘩好好教训一番了。可谁承望，张母不但不恼，反而大喜过望，一把将儿子揽进怀里，亲了又亲，吻了又吻，嘴里说：“看，俺儿子就是有出息，这么小就学着坐堂……”

志奇没辜负母亲望子成龙的苦心，十年寒窗，一朝成名，雍正七年（1730）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先授直隶内邱令，后升任冀州知州，调涿州知州，累官至宣化府知府。

张母教子成才为后来的北岭人树起一个楷模。北岭的青少年读书求学有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清光绪年间兵科给事中王会英《弹劾山东巡抚福润纵吏毒民折》和《弹劾山东巡抚李秉衡刚愎自用折》给自己在民间树起良好的口碑。王会英，字筱卿，号愚村，台子庄人。同治十二年（1873）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不久入谏院，任兵科给事中，后又署户科给事中。正是在担任给事中期间，王会英恪尽职守，屡次弹劾疆疆大吏，为民请命，“人皆以骨骸称之”。上述弹劾福润的奏折中，王会英一方面揭露了前任利津知县钱铁纵使汛官王固柱借灾民迁徙之机掠夺耕地，强索祖税，吞没库银，中饱私囊，另一方面又详细陈述了在后任知县吴兆猷鞭笞推逼之下，利津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痛斥吴兆猷视死不救……犹为其母庆贺祝寿，搜刮民脂，大排筵宴。看了《官场现形记》你再体味王会英在晚清能有此胆识，会觉得他实在难能可贵。而读完《古文观止》再读王会英的奏议仍能耳目一新，也足见其文字功底之扎实，才华学问之精深。王会英晚年

致仕归隐，其著作曾有《鸿雪轩诗集》8卷，《荆华书屋课艺》12卷，《馆阁诗集》及律赋论策各若干卷流传于世。他的为官清廉为世人称颂，成为北岭人的骄傲。

北岭这片土地上，读书人多，进士、举人、秀才也多。但并不是所有中举人中进士的人都能像岳镇南那样风光。

薄家庄的薄绍绪是北岭这片土地上最后一位进士。据说他小时候家里穷，也无意功名，为了混口饭吃，倒是好些次替人下科场应试。科举制度是一项非常严格的文官选拔制度，想找人代考是很困难的。而代考事件一旦被发现有代考者，则代考者与被代考者都将革去功名，从此再无出头之日。好在薄绍绪被发现他发现的几次都是挨一顿板子就给了放，所以他后来才有机会自己亲下场，并最终于光绪二年（1876）中进士。此时绍绪年纪已经不小了，被封为广东即用知县。即用就是候补，可不等候上缺，他便已经故去了。这个人物凄凉的一生引起多少人的兴叹，但在无形之中，为后人留下了不死不灭的勤学精神。

直到今天，年长的人都知道清末民初薄家庄出了个大师薄如鉴。薄如鉴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秀才，宣统元年（1909）举孝廉方正。此时延续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业已寿终正寝，薄如鉴中进士授翰林的路子已经被堵死了，所以他最终没有能够金榜及第，只是隐居乡里，教书为业。教廉开馆授业，束修

拜师者络绎不绝，廉府上门槛若市，大老师的盛名远播四方。

王恺，一个令今天的北岭人感到陌生的名字。是他，在建国初期为北岭，也为利津赢得了文学创作的第一份辉煌。他的小说《夜航》、《群妮离婚记》，诗集《周槐亭》、《一面墙》、《水兵的歌》为这片获得新生的土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文化乡带来了新的活力。五六十年代看电影在乡下人是一种奢侈，能看上老乡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那更是一件让乡下人想都不敢想的事。王恺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无名岛》应该为家乡的人民带来一份满足，有如利津人看赵焕章执导的《喜盈门》一样满足。六十年代中期，王恺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水下阳光》，七十年代末，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碧雾港》……作家远离了这片土地，乡人们也淡漠了他的名字，可他为文化乡创造的这份辉煌，却将永远地被载入历史。

与王恺先生齐名的济南军区话剧团团长陈戈，北岭乡盖东村人。青年时代就组织剧团演革命戏，但与作家尚有距离，自另当别论。

罗先哲，《利津县志》主笔之一，五十年代开始发表剧本，小说。还有郭宝源、曲德胜、王学理、薄剑峰和那些怀着一点虚荣心，一次次把利津县把北岭乡写进文学作品的作者们，文化乡哺育了他们，他们也千方百计要为文化乡扬名。

八十年代初，利津县结束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文教合一，开始设立专门的文化行政机构——利津县文化局。第一任文化局长刘建华，北岭人，军转干部。从履历上来看，他实实在在是一介武夫。正统军人管文化，往往会让人从中间窥探出一点戏剧性效果。然而，实在令人失望，刘建华只用几件小事就向人们表明：军人照样管文化，军人照样懂文化。

文化馆是文化局的下属单位，上任不久，有人向刘局长反映文化馆几位创作人员拖拖拉拉，不老实坐班，不遵守作息制度。刘局长略作思考，然后说，搞文艺创作的，也许他们早晨八点钟还没起床，可也许他们晚上十二点多还不睡觉，他们自己能遵守作息制度，可灵感不能，我看，要求坐班，太难为他们了，不妨让他们自由点，到那时候他们的成果就是了。

县里办书画展览，刘局长陪着大家看展出，他能随口说出几幅古国画里边蕴含的每一个典故，有两位作者激动得当场就要以作品相赠。

刘局长不只是一介武夫，竟能如此谙熟文化之道，让许多人费猜想。在他离休之后，人们才知道他有中专文凭，军校的，也算

1985年，我所在的炮兵团，在云南老山区执行任务。10月的一天，时任前指司令员的张太恒将军到我们炮兵团视察。刚刚听完团长的简短汇报，司令员若有所思地问：“这个团有广饶籍的吗？”确切地说，作为前指司令员，他对这个团队的情况是会有十分清楚地了解的。“有，我们政治处张主任就是！”团长回答。“让他立即来见我！”将军象在下达作战命令。“因为事先没有通知，团里的领导没有全部到。张主任到前指一个观察所去了。”团长解释得很清楚。那时首长视察是从不预先通知的，同时大家都知道观察所同指挥所相距十多公里，且都是山路，必须步行，事先不知道，临时通知，要赶回来，时间也就太长了些。“那么，让他明天十天前，到前指我那里去一趟！”将军的话十分明确，但也缓和下来。听得出他急切地想见见这位同籍的下级军官。

我从观察所回到指挥所，已是当日十九时了，团长立即把这情节告诉了我。那时张太恒将军调成都军区不久，接手前指的工作较短。对他原籍是广饶，我毫无所知。听了团长的话，我如坠五里云雾中，不明白首长是何意图。

次日，我遵首长的指示，按时到达前指——一个边陲小镇上破旧的庭院里。

在首长身边工作的副秘书长很快引我进了将军的办公室（其实应叫办公室兼宿舍）。军礼之后，将军用他那宽大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广饶老乡，相会在西南边疆，也属不易。”一句话打消了我的局促，拉近了我和将军的距离，也知道将军此举多半意在寄托思乡之情。谈话从互问哪乡哪村开始了。将军回忆了他在家乡时的一些往事，其中多是艰辛坎坷，也有几多童年、少年的稚趣。他谈家乡的地理风景，风俗人情，有着自豪，也有着企望。接着他又再三询问了家乡的变迁。当时，我因到云南已有近一年，在山东时也多半在外地当兵，对于家乡变化的了解如残云般片段。谈话中也只有尽我所知了。对于我不甚了了的回答，将军好象已是很满足了。看得出他挚爱着那方土地和人们。我常常这样想：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定会热爱自己的故乡；一个热爱人民的人，他也会热爱爱故土的人们，自古亦然，我再从从

一个知识分子。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文化乡开始重振雄风，大规模向社会输送人才。积蓄多年的力量喷薄而出，一发不可收，文化乡的子子孙孙再一次让利津县叫绝。开初几年都是自由报考，所以今天已经很难统计那几年北岭到底有多少人考入了大中专院校，这几年虽说各学校都有统计，但有相当一部分中学毕业生名落孙山之后仍不肯就此罢休，苦心孤诣地四处求学，四处投考，要找一份准确的统计，也并不容易。这里，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透视文化乡历年向外输送人才的情况。

1996年9月8日，北岭乡维新村。为庆祝村中柏油路竣工通车，在十字路口立起一块“路满乡情”的石碑，给积极捐资为家乡修路的四十多位在外工作人员刻石留名，揭碑典礼非常隆重，那些不同年纪，不同辈分，不同职业，不同阅历的人们应邀回到曾经哺育过自己，培养过自己的村庄。这是文化乡一个普通村子对这几年输往社会各界人才的一次不大不小的检阅，四十几个人，有一大半都是通过考学走出村子的，而且这里边并不包括那些乡亲们不肯向她们伸手索取的女孩子。

二十年了，各村都在一年多似一年地向输送中、大、大专生、本科生，到底有多少？各村的文化书有数，派出所的户籍簿有数，学校、老师反而没数了。你问一下，哪个果农能知道自己树上共结过多少果子？

“路满乡情”，这四个字来自维新村一位退休老教师的思考。他，薄成勋，曾经在教育战线上奋战了整整三十个春秋，然后他把教书育人的这副重担交给了自己的三个儿女。老人的长子薄其敏自1976年师专业毕业后便加入了援藏大军，一去二十年，现在是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教体委主任。儿子在西藏奉献了二十年，父亲在家乡盼望了二十年，为了冲淡对儿子的思念，也为了能让孩子在西藏更加专心地工作，父亲把儿子的一双儿女留在自己身边，从喂奶开始，一直到他们读小学、中学……

文化乡学校出名，薄庄完小、新台完小、北岭中学从一建校就出名，几十年长盛不衰，现如今北岭乡活跃在各地各部门的那些文化人也大都与这几所学校有渊源。

文化乡教师出名，像王峰岭，薄一斋，寇芝亭、薄廷山，那都是享誉全县的名教师。尤其在解放初期，大局方定，百业待举，他们顺利地完成了文化乡由旧式学校教育向新式学校教育的过渡。他们的弟子，薄庄完小、新台完小的前几届毕业生大部分也都从事教育工作，一脉相承，直到今天。

王峰岭是个奇人，他幼年丧父，半耕半读勉强读完学业，学

陪同张太恒将军在某连视察。

走近黄河口



## 将军殷殷乡土情

将军身上得到印证。谈话不知不觉已到中午，将军热情的留我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

午饭后，将军详细地了解了基层政治工作情况，并一再嘱咐执行任务，环境恶劣，生活艰苦，随时还会有牺牲，思想工作要做细、做活，做扎实。要寓教于乐，要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政治工作要切实保障军事任务的圆满完成。我切实体会到了将军心系祖国的安危和基层官兵的苦难；他把爱家乡、爱祖国、爱战士结合得那样紧密。谈话持续到十五时，我离开前指，回到部队。临行前将军一直送我到大门外。

在将军的关怀下，我们炮兵团扎扎实实开展

展思想政治工作。集团军多次推广了我们团开展爱国奉献教育，尊干爱兵活动和阵地文化活动的经验。期间将军曾两次听取了汇报，并两次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连队进行检查指导。

1986年6月，部队顺利完成任务，撤回山东，将军仍在成都军区任职后，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近来听说因年龄的原因，已退出领导岗位。多少年来，将军关怀自己的家乡情也真意切，近年来尤其甚，听说他经常为家乡的发展奔忙。

一晃12年了，我始终忘不掉将军殷殷

历不高，却靠自学赢得了“半部辞源”的美称。建国后，他先后担任新台完小、利津二中、利津一中校长，二十余年，为北岭乡，为利津县、垦利县、沾化县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颇受学界推崇。五十年代初，他在垦利中学（今利津二中）任校长时，据说有一位俄语教师挑了子，王校长一边认真做该教师的思想工作，一边亲自兼课顶班。王校长没学过俄语，他只是凭自己超群的智力，晚上反复听留声机自学，白天上讲台讲课。一连几天，那位老师不相信王峰岭能教俄语，可躲在教室外边一听，他竟一点没有教错，不得不佩服王校长的才能，回心转意重新走上了讲台。

陈庄镇是利津县北部重镇，设在这里的利津二中几经沧桑之后仍然在人员设施各方面保持了与利津一中平分秋色的综合实力。由于地缘关系，近半个世纪以来，利津二中为北岭乡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北岭乡也有大批的文化人在利津二中展示才华，建功立业。继校长王峰岭之后，又有薄纯学、赵炳琪、罗先捷、马俊山、薄立德、王学理等大批北岭人在这里奉献着自己的年华、知识、汗水和热血。尤其恢复高考以来，北岭乡输出人才中的相当一批师范院校毕业生来到了利津二中，以至于在这里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北岭人的强大文化教育阵容，他们或老当益壮，或年富力强，或风华正茂，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不失为文化乡造就出来的又一道美丽风景。

老教师罗先捷从教几十年，一直是利津县教育界的骨干力量。直到今天，他的门人弟子们仍能说出他的一板一掌掌来，或叹服，或大笑，回味之余仍觉受益无穷。罗先捷教课之余钻研文史，特别是在文史资料搜集整理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与其胞弟罗先哲被利津文教界合称为“二罗”。

现任校长王学理是恢复高考后北岭乡大学生中出色的一员。名曰“学理”实则学文，他功底扎实，才华横溢，深得前辈赏识和年轻人钦佩。学理多年从教，后来曾一度担任利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可最终又回到了教育战线上，担任利津二中校长。

老教师薄纯学在薄家庄辈分比较低，但他受到人们的尊重并不亚于家族里那些辈分远远高过他的人。这与他从教日久，桃李众多是分不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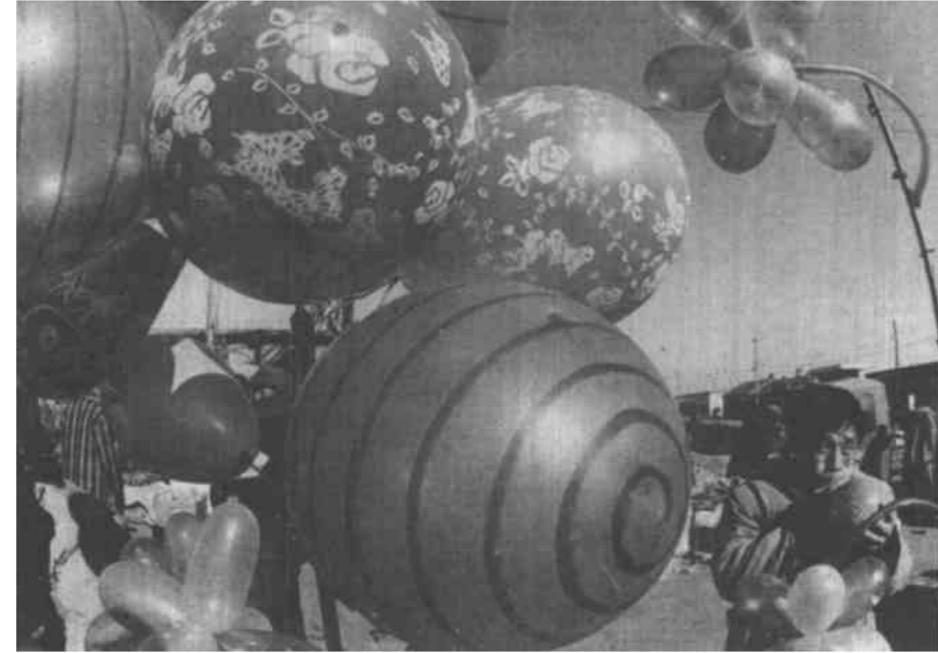
李维群是个普通的农民，文化一般。他担任过村干部，开过轧棉房，办过砖瓦场，是村里的冒尖户。不过令他感到欣慰的不是自己手里多了几个钱，而是他那个争气的儿女：长子李希勤，滨州医学院毕业，医生；次子李常德，曲阜师大毕业，中学教师；（下转四版）

五味诗画  
责任编辑  
张金康

### 吹的生意

吹牛的德行人人烦，吹球的买卖赚大钱。谎言讹传是非变，彩球装扮天地鲜。莫论职业贵与贱，唯求美好留人间。

徐兆鹏 摄 童欣诗



反腐斗争以来，广饶县纪委、监察局以强烈的政治敏锐性和高度的责任感，不断加大查案力度，取得了较大的阶段性成果，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的党风廉政建设和经济建设。仅1995年至今，立案各类违纪案件143起，其中万元以上经济大案19起，为国家集体挽回经济损失143.54万元。本文所述故事就是他们查获的众多案件中一例。

## 智斗“活神仙” 清查十年“陈旧”案

任家大营村9人贪污窝案的查处是缘于部分群众的自发“闹事”。去年夏粮征购时，大营村群众反映村干部经济上不干净。一齐扬言弄不清他们的问题，就不交征购粮。很长一段时间，全村只有9户完成征购任务，并有87户群众见村里调整出的370亩土地被闲置起来，便一哄而起，纷纷抢种了农作物，少的5.6亩，多的30亩，共分抢250亩，村班子失去了号召力。为此，乡党委研究决定，由乡纪委书记项玉泰牵头，组成七人工作组，对该村进行集中整治，清理村财务。

清理村财务，首当其冲的是接触村会计某。现年61岁的任某是村里有名的精明人，从事村会计工作已34年，不仅业务熟悉，而且能拍会算，精通“风水”，善办红白喜事，许多村民称他是村里的“活神仙”。工作组进村后，便决定先会会这位“活神仙”。初次调查，名不虚传，他不仅会说会道，而且村里的财务管理得比较规范，其帐目井井有条，无懈可击。工作组人员仔细查找数天，没有发现任何差错，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乡工作组负责人向乡纪委作了汇报。乡纪委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感到原村两委班子成员，在村里混乱之际贪污公款的可能性很大，并很有可能设有第二本帐。于是，乡纪委派出有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到乡工作组协助工作，再斗“活神仙”。这一次他们没有就帐就帐，而是收来帐本，请村班子成员分别回忆村财务收支情况。随着细致的追问，漏洞出来了。同时经办一件事的人，讲的数额不一致，有的与帐不符。鉴于这种情况，工作组加大了对任某的工作，交待有关政策，使任在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交待出：箱子柜里还有本帐。工作组立即派员到任的家中搬来了锁有帐外帐的木柜子，封查了他的第二

本帐。由于他的第二本帐未作“处理”，两本帐相对，查案人员很快发现他以少记多的问题。当让他交待问题的时候，他却装起了糊涂，不是年老忘了记不清了，就是日子久了想不起来了，上午承认了，下午就想翻供，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在威严的办案人员面前，任某再也没有以往那副“神”气了。

发现第二本帐后，工作组立即进行了核查，越查可疑线索越多，越查越有劲头，一鼓作气倒查了十年的财务帐，直查到1986年。这十年正好全部涉及群众反映的村干部。工作组组查旧帐，个别别人慌了，不敢给工作组施加压力，有的找来在外工作的亲友说情开脱，有的酒后到工作组住处指桑骂槐。还有的唆使一村霸大闹工作组。有一天中午，这个村霸手拿一把铁锤，闯到工作组胡搅蛮缠，并动手动脚，企图干扰阻碍工作组深入查帐。（司法机关对其进行了调查处理。）这一切更坚定了工作组查帐的信心和决心，他们查的更细了，核的更实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辛工作，终于查清了该村自1986年至1995年这十年间3任党支部书记、2名党支部委员、1名村党委委员及村会计、保管、电工等9人，采取收入不记帐、造假单据顶帐、重复报帐支出等手段进行贪污或合伙私分公款38472元的犯罪事实。该违纪国法者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村会计任某累计贪污公款5969元，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其他8人，均按照他们所犯错误事实和情节轻重，给予了应有的处分，有的被开除了党籍，有的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 《四库全书》与七阁藏本

清政府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肇始,组织当时各学科最有成就的学者,以十年时间,编纂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四库全书》。全书以经、史、子、集分类,荟萃乾隆中期以前历代典籍共3641种,79309卷,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万里长城。

《四库全书》修成后,先是缮写四部,分藏内廷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故宫的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溯阁。(以上合称内廷四阁或北四阁。)后来又抄写三部,分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以上合称南三阁或后三阁)。史称“七阁藏本”。

世纪风云,变幻莫测,“七阁藏本”,历经沧桑,各有不同的命运:

圆明园的文源阁藏本,咸丰十年(1860)九月九日,同圆明园一起,尽毁于英法联军之手。

奉天故宫的文溯阁藏本,截至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曾一度落在日寇手中,惨遭损害,散佚严重。后经各方人士多次抄补,得以完善。文溯阁藏本现由甘肃图书馆珍藏,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北京旧紫禁城内的文澜阁藏本,系清廷缮写的第一部《四库全书》,其校勘之精湛,缮写之工整,堪为“七阁藏本”魁元。该阁本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入藏后,一百五十二年无恙,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春,因日寇大举进犯热河,威胁天津,国民党政府遂将文澜阁藏本移藏上海天主堂街原中央银行内。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不顾学界抗议,将文澜阁藏本全部运往台湾。

“从此空留文澜阁,珍藏一去未回来。”但据说现存台湾的文澜阁藏本,深得各界人士的珍视,一直受到较好的保护。

南三阁中的文宗阁(江苏镇江金山寺),文汇阁(江苏扬州大观亭旁),相继于咸丰三年(1853)、咸丰四年(1854),毁于兵燹,两阁藏本,片纸未存,化为乌有。

南三阁中的文澜阁,系由杭州圣因寺藏书室改制

而成,咸丰十年(1860)倒塌,书库散佚殆尽。二十年后的光绪六年(1880),浙江重建文澜阁,藏书亦经屡次搜集、修补、抄录,得归旧藏。文澜阁藏本散而复聚,失而复得,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传奇。文澜阁藏本现由浙江图书馆珍藏。受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

“七阁藏本”中唯文澜阁藏本一生平安。文澜阁,乾隆三十九年(1774)始建于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内,次年告峻。乾隆五十年(1785),第四部《四库全书》入阁珍藏。民国四年(1915)文澜阁藏本运抵北京,先藏古物保存所,后拨归京师图书馆。民国九年(1920)经陈垣点校,民国十七年(1928)经谭新嘉等查点,均无重大散佚,基本完好无损。现为国家图书馆镇库国宝。

风雨雨雨一百年,多灾多难的“七阁藏本”以三亡(文宗阁藏本、文汇阁藏本、文源阁藏本),二伤(文澜阁藏本,文溯阁藏本),二全(文澜阁藏本,文溯阁藏本)的代价与结果,和我们的民族一起,走过那血与火的苦难岁月,最终赢得了《四库全书》“完璧归赵”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仅十分重视“七阁藏本”存世秘籍的保护和完善,同时也高度重视“七阁藏本”存世秘籍的开发和利用。经国家批准,八十年代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七阁藏本”存世的文澜、文溯、文宗、文汇四阁秘籍为依据,陆续影印出齐全套《四库全书》,成为轰动世界的文化要闻。今天,当世界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打开《四库全书》的时候,当人们遨游在《四库全书》中浩瀚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海洋的时候,谁也不会忘记《七阁藏本》在保存这一旷世奇编中建立的盖世功勋。(天五)

佛家修行,讲究的是跳出“三界”,“六根清静”。作为领导干部,要战胜自我,树立正确人生观,也应跳出这样的“三界”:

## 跳出“三界”新释

赵吉林

一是跳出“财界”。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作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早已被无产阶级割得体无完肤。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却又成为一些人的生活信条。为了捞取钱财,有的领导干部不择手段地行贿、贪赃枉法;有的不顾党纪国法、国格人格,丧失了党性和做人的尊严;有的不惜集体利益,干出坑蒙拐骗的勾当,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诚然,人离不开钱,但金钱和财物终究要腐烂,而党和人民的事业永存。一个党性不强,重事业的领导干部,是不会把人生的砝码定在拥有钱财的多少上的。

二是跳出“奢界”。“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有段时期,我们有些干部把“工作无所谓,生活别太累”作为信条,甚至错误地认为,“勤俭朴素是寒酸,吃苦耐劳是傻”,奢侈摆阔是资本,挥霍浪费是权威。孰不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还

很不发达,还不是追求享乐的时候。再说,即使是到2010年远景目标实现了,物质财富丰富了,仍很艰苦创业。

三是跳出“官界”。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多少年来,许许多多党员干部严格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办事,把当官的与为人民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涌现出焦裕禄、孔繁森、李润五等为党鞠躬尽瘁,深受人民拥戴的好干部。但也有请客送礼,乱拉关系,沽名钓誉,贪污腐化,嘴软手硬的干部。如此只为做官,不为做事的人,官位越高,权力越大,对党的事业危害越大。

追求“财”、“奢”、“官”的境界,与我们的宗旨格格不入,但由于这“三界”具有一定的诱惑力,一些意志薄弱者容易把自己装进去跳不出来,有些经不住诱惑的领导干部还成了俘虏。我们每个同志都要吸取教训,加强党性修养,跳出“三界”,努力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上的纯洁性。只有这样,才能有一个充实、完整的人生。



利津县文物管理所收藏有一件响螺碑拓本。从立碑题记看,是拓于西安碑林。响螺碑又名禹王碑,原碑在响螺山峰(即湖南衡山),青石刻制,高3米,宽2米,重7000公斤,刻文七十七字。此碑何时何人所立,碑文是什么意思,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 从馆藏响螺碑拓本说起

王增山

相传大禹登衡山,梦见苍水(仙人)使者授金简玉书,得治水之要,刻石记之,立碑于响螺山峰;又说此碑系后人附会所为,碑文记述了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响螺碑被奉为神碑,历代文人墨客前往访问者不乏其人。唐代诗人韩愈在永贞元年探得响螺碑有诗云:“响螺山中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摩奇……千搜万索何处在,森森绿树猿猱悲。”北宋末年,金石学家赵明诚(李清照之夫)探访响螺碑时,在衡山刻石为记:“丙辰年至此寻禹碑真迹未获而去。”

宋嘉定五年(1212年),何致为樵夫所导,攀岩越涧找到了响螺碑,遂临摹刻石于岳麓山顶。尔后,此碑又隐没了四百多年。到了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太守沈潜搜得此碑,剔土摹拓,始广传于世。南京、昆明、成都、绍兴等地皆有复刻。清康熙年间,江苏武进人毛会章,视响螺碑为金石之冠,亲诣岳麓碑所临摹,立碑于大别山和西安碑林。

响螺碑字形怪异,非篆文、蝌蚪文,与殷商甲骨文、金文亦不相同,实难辨认。自明代以来,杨慎、沈德潜、杨廷相、郎瑛等,对此碑皆有释文,然所不一,迄无定论。

清代金石学家李佐贤,于响螺碑有深刻的研究。咸丰初年,李佐贤辞官还乡途经长洲(今江苏吴县),在朋友处见到了响螺碑拓本。真拓难得,弥足珍贵。之后,李佐贤对响螺碑作了认真的考证。他在《跋响螺碑》一文中说:“辨析金石文字之真伪,非实物、真拓不足凭。响螺碑在衡山真隐屏后,人迹罕至,得见者鲜。碑字已剥蚀不完,然笔画奇诡,气概雄杰,所谓龙画螺书诚非虚誉,诘仿者所能造。”剖析入微,见解精辟,给后人研究响螺碑以很大的启示。

某法院院长乃瓦工出身,因勤奋好学考取政法学院,毕业后又因工作成绩卓著,连结数起大案要案。有记者采访:“当瓦工和当院长各有何感受?”答曰:“相同。”记者惊曰:“何以相同?”院长笑道:“在高处,头不晕、手不软方能站稳脚跟。”

更困难,顶住就是胜利。范弗里特惊呼:“共军都是用烈性的酒醉了的疯子”。由于伤亡惨重,美韩军队内部也互相指责,骂声不绝。美军士兵指责韩军士兵是不懂战术的猪,而韩军士兵则对美军的保命哲学嗤之以鼻,说美军的士兵是“缺乏五十码以内的攻击能力”。



这张李鹏总理补大衣的照片摄于1996年12月8日下午。李鹏有两件大衣,这件雪花呢大衣缝制于1985年。去年12月下旬,他将出访俄罗斯,为此工作人员12月8日中午从衣柜中找出这件大衣。李鹏见到大衣的左袖上被虫子咬了一个小洞。于是,他找出针线就亲手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不到半小时,大衣被缝补得可以评价为完好如初。正巧,工作人员发现这个场面,便拍下了这张照片。

据朱琳介绍,李鹏的“针线活”做得相当好,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她自己都帮不了他。过去,有时衣裤破了,他就自己缝补。就是在担任总理后,他还一针一线地做过一床被子,其“工艺”水平还不错。就是这床李鹏亲自做的新被子,还未来得及使用,就捐给了淮河受灾的群众。(摘自《中华英才》第3期)

当日黄昏,寒风呼啸,天空阴沉,气温骤然下降至零下。穿着单薄的韩军纷纷缩进地堡里。在秦基伟的指挥下,志愿军以山、野榴炮70门、迫击炮30门、火箭炮24门进行火力急袭,第九十二团三个突击连,在炮火掩护下发起冲击。与此同时,第八十七团一部,对537.7北山左翼敌人盘据的注子洞南山佯攻,以牵制敌人兵力、火力,支援第九十二团突击。战至17时50分,全歼韩军第二师十七团一个营,全部恢复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王琼琼编 作者徐晋祥)

# 历代名人爱植树

被誉为“柳痴”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生平最爱种柳树,他不仅在归隐的住宅周围种上了五棵柳树,而且还特意在房前也种上了五棵柳树,并自号“五柳先生”。

诗人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边的草堂寺选择了一块有林塘之胜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草堂,并在草堂周围植了树。草堂建成后,他写了一首《堂成》的七言律诗。诗人还特别喜欢桃花:“江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奉乞桃花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便是诗人痴爱桃花的生动写照。

宋代苏东坡也是一位爱植树的大诗人。他在杭州任职期间,曾主持筑西湖苏堤“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使西湖增添了“东风二月苏堤路,树对桃花问柳花”的美景。

植物更要爱树、护树,被称为“植树将军”的爱国将领冯玉祥,曾有过“马嘴一树,枚则二十,植十株”之规定,他因带领官兵大量植树而受到民众的称赞。驻军徐州时,他还写了一首护林诗喻之军民:“老冯在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李树柯)

古时候,有两个秀才住到了一家店里,夜晚,两人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房子的墙壁上有个窟窿可挂衣袍。一个秀才嘟囔道:“怎么没个窟窿呢?”另一个秀才接过去说:“窟窿怎么写呢?经书里没见过呀。”那个秀才找了个小木棍,插到墙壁里说:“棍是木头的,墙是土的,‘木’‘土’合起来就念‘榦’吗!这个秀才点头称‘是’。可是老店家在屋外听到他们的话,却大哭起来。秀才惊讶:‘老人家为何悲声?’老店家顿足说道:‘俺祖祖辈辈都姓‘杜’,今天又让俺姓‘榦’,你叫俺有什么脸面去见祖宗啊!’”(鞠展)

每周一谜  
生日聚会  
(打一字母,谜底见下期周末)  
上期谜底:成双成对



# 生日与生肖

一个人的出生日期,是由年、月、日构成的。中国旧时以天干十字与地支十二字互相搭配,每两个字代表一定的年、月、日、时,构成了一个人所谓的“生辰八字”。俗话说“生辰八字”可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甚至婚配。随着科学文化的普及,以“生辰八字”表示一个人生日日期的方法渐趋消亡,以十二种动物配十二地支记人的生年,即十二属的生肖纪年方法,一直沿用下来。

生肖纪年法,即十二年为一轮回,俗称一仄。据考,这种纪年法始于东汉年间。在此之前,已有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和天干地支相配合的六十甲子,只是用来纪日,并非用来纪年。在东汉年间,天干地支六十甲子才开始用来纪年。

地支十二字,分配十二种动物,最早是代表政治地位来讲的。如《吴越春秋》:“吴在辰其位龙也,……越在巳其位蛇也。中的“辰龙”“巳蛇”。大约在汉前后,十二属动物才被用来与十二支配纪年,由此生肖纪年法便形成了。由于它易读易记,所以便普及和流传下来。(油田师专 罗萍)

秀才与「榦」

# 毛泽东家教二三事

毛泽东共有过10个子女,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大半都夭折或失落了。幸存下来的只有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和李敏、李讷两姐妹。但是,毛泽东对他们的教育非常严格,对最小的女儿李讷也是如此。

1947年,李讷才7岁,便跟当兵的一样行军、风餐露宿、受飞机轰炸,听惯了子弹的啸叫,闻惯了硝烟的辛辣。行军之余,举着小搪瓷杯,和众多战士一样,排队从大铁锅里领一份黑豆。

1963年初,李讷在给父亲的信中汇报了自己的思想,谈起课程中学到《庄子·秋水》篇的体会,认为其中的主人公河伯(传说中黄河水神)鼠目寸光,自高自大,是不可取的。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深为女儿的成长感到高兴,立即回信予以鼓励。信是这样写的:

李讷娃: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要希望了。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就不要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

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1958年初,李讷因患急性阑尾炎打针,针头断在肌肉里,连续做了两次手术,引起伤口感染、发烧。毛泽东为此非常担心,工作一通宵,临睡前挥笔草书一信。信中写道:“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曳,悲观袭来,信心动摇……意志可以克服病痛。一定要锻炼身体。你以如何?……?”信末还抄录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摘自《家长》 作者王历科)

接受询问,有志向的,有兵团的,有友邻的,也有来自下面的……唯独没有来自前线的声音。电话线被炸断了,电台被炸毁了,话务员被震死了或震聋了。数小时之后,秦基伟终于得到了战报。敌人避实就虚,选择险峻的五圣山进攻多少有点出乎他的意外。会不会是东击西?

战斗打到了日暮黄昏,美韩军队发了九牛二虎之力,抛下千名尸体和伤残之躯,最后只夺去半个上甘岭。从敌人投入的兵力及后续力量上看,战

# 上甘岭战役中的秦基伟

斗规模始终有增无减,这似乎很能说明问题了。五圣山方向激战一天,而十五军其它方向未出现慌乱情况。敌人即使东击西、意图他谋,战到此时,也该大失所望了。种种迹象表明,五圣山之战,短时期内结束不了。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当真赤膊上阵,要在五圣山上玩老命了。

秦基伟决定调整部署。当晚,他接通洪学智副司令的电话。“说吧,要什么。现在其它地方动静都不大,就你们辛苦了。十五军要什么我给什么!”

秦基伟眼窝热乎乎地有些发潮:“给我一点炮吧。”“什么炮?”秦基伟冲口而出:“喀秋莎!”洪学智像牙疼似地吸了一口气,但很快,爽朗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行啊,最迟明天中午前赶到!”

秦基伟这回真的动感情了,低沉而有力地说:“洪副司令,十五军给你敬礼!”秦基伟满面春风地迎来一个满员的火箭炮团。之后是七天七夜的鏖战。拼到最后,只剩下意志了。

美韩军队先后共投入17个营的兵力,伤亡已逾7000之众。据美国一位随军记者报道,一个连长点名,下面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秦基伟也十分清楚,他投入的兵力比美韩军队的少,因此伤亡的单位比例更大。

10月21日,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同秦基伟通话,询问秦基伟对于战斗的设想。

秦基伟说:“这种拉锯式的反复争夺,已进行七昼夜了,表面阵地失而复得,多次易手。为了争取时间,我的意见是暂停反击,前部队转入坑道,以小分队活动和敌人周旋,把敌人抓住,牵住他的牛鼻子。同时调整部署,整补部队,研究战术,抓紧准备决定性的大反击。”

司令部批准了秦基伟的设想。坑道战异常艰苦,坑道被敌人炮击和炸弹轰炸越打越短,容积越来越小,人挤人,不便行动,烈士遗体也只能暂时停放在坑道里。坑道内严重缺水,战士们舔吮坑道壁上渗出的一点水珠,甚至以人尿解渴。

火线运输员,医护人员一批又一批派出去,却大都倒在封锁线上。坑道部队反映萝卜吃多了烧心,最好送苹果。十五军后勤部派出人员,昼夜兼程,到平壤一带紧急采购6.3万斤朝鲜苹果,秦基伟等军首长也掏出自己为数不多的“私房钱”买来苹果。

可是,敌人炮火封锁得太严密,大堆的苹果送不上去。四十五师党委发出号召:凡送上去一篓苹果者,记二等功。然而,没有一篓完整的苹果能冲过封锁线。最后,只有一只苹果进了坑道。

当时,整个朝鲜战场其它地方的枪声稀落了,板门店谈判桌上谈判双方都等着上甘岭打硬仗,谈判桌前谁的腰杆就硬。对此,秦基伟的答辞始终只有一个:请各级首长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

严峻时刻,秦基伟仍然气贯长虹——他一个独特的理论:老子困难,范弗里特老东西



